

西南石窟文獻

第八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第八卷
西南石窟文獻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八輯

西南石窟文獻

第八卷

PDF

本卷目錄

一	四川各地石窟 國家文物教育局編·····	一
二	煌煌巨制的四川石窟藝術 溫玉成撰·····	一七
三	四川石窟雜識 丁明夷撰·····	五八
四	四川唐代佛教造像與長安樣式 羅世平撰·····	八四
五	試談四川的道教石刻 吳覺非撰·····	一〇一
六	四川省道教摩崖造像 王家祐撰·····	一〇九
七	四川道教石窟造像 胡文和 曾德仁撰·····	一三六
八	四川道教石窟造像(續) 胡文和 曾德仁撰·····	一五五
九	道像造型中的蓮臺及其它 石衍豐撰·····	一七一
十	敦煌與五代兩蜀文化 龍 晦撰·····	一七八
十一	四川五代石刻考察記 尹建華 曾如實撰·····	一九二

十二	四川石窟華嚴經係統變相的研究	胡文和撰	二二三
十三	四川和敦煌石窟中『西方淨土變』的比較研究	胡文和撰	二二三
十四	四川摩崖造像中的『大方廣華嚴十惡品經變』	胡文和撰	二三六
十五	川北石窟札記·從廣元到巴中	丁明夷撰	二五四
十六	四川石窟現存的兩尊萬回像	羅世平撰	二七六
十七	從川北石窟實測談石窟寺立面圖施測方法	王樹林 唐志工 張 寧撰	二八三
十八	一佛五十菩薩和菩薩裝佛	李已生撰	二八九
十九	廣元千佛崖簡介	溫廷寬撰	三〇六
二十	關於廣元千佛崖造像的創始時代問題	史 岩撰	三一七
二十一	廣元千佛崖摩造像	盛 偉撰	三二三
二十二	廣元千佛崖石窟調查記		
	廣元市文物管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佛教室編		三二八
二十三	四川廣元縣皇澤寺調查記	張明善 黃展岳撰	三五八

二十四	廣元皇澤寺石窟調查記	
	廣元市文物管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所佛教室編	三六六
二十五	千佛崖利州畢公及造像年代考	羅世平撰
		三七三
二十六	廣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	邢軍撰
		三七九
二十七	四川巴中南龕的摩岩造像	陶鳴寬撰
		三八八
二十八	略述巴中石窟的現狀及其時代特征	程崇勛撰
		三九一
二十九	巴中南龕摩崖造像考述	苟廷一撰
		四一一
三十	巴中摩崖造像中的佛教史迹故事初探	寧強撰
		四二一
三十一	巴中南龕第九十三號毗沙門天王造像龕新探	寧強撰
		四二七
三十二	巴中西龕石窟調查記	巴中市文物管理所編
		四三七
三十三	巴中石窟三題	羅世平撰
		四四七
三十四	通江縣的摩崖造像	陶鳴寬撰
		四五七
三十五	劍閣縣的道教摩崖造像	蔡運生撰
		四六〇

三十六	劍閣鶴鳴山道教造像	黃邦紅撰·····	四六六
三十七	道教的發源地·劍閣鶴鳴山	蔡運生撰·····	四七〇
三十八	四川劍閣鶴鳴山道教石刻	母學勇撰·····	四七六
三十九	合川涑灘摩崖石刻造像	黃理任進 楊旭德 羅世杰撰·····	四八二
四十	四川邛崃石筍山唐代摩崖造像	胡文和撰·····	四九一

四川各地石窟

國家文物教育局

第一節 四川石窟研究史

總的來說，國內外對四川石窟的調查進行得不多。調查最早的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由三個法國人（色伽蘭、瓦占、拉狄格）組成的中國考古調查團。主要是調查陝西的秦漢陵墓、四川的漢代崖墓、漢代石闕及佛教遺迹。他們對廣元和巴中一帶石窟遺迹進行了調查，於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中國考古調查團圖錄》共三卷，其中二卷圖版，一卷文字。四川佛教藝術過去鮮為人知，自法國沙畹幾次調查以後，才逐漸被人們認識。色伽蘭等人重點調查了廣元、巴中地區的佛教遺迹。

關於廣元千佛崖，色伽蘭等人根據當時掌握的文獻及石刻的銘記，以及觀察到的雕刻樣式，他們認為千佛崖最早造像是公元七二二年（開元十年）。後來，一九三五年興建公路，千佛崖遭到破壞，所以這部分資料非常重要，對研究廣元有很重要的意義。當時還考察了廣元的皇澤寺，但沒有發表更多的意見，對巴中的千佛崖，認為西山觀可能有隋代造像，可能是指現存的西龕。他們還考察了嘉定大佛，認為嘉定的石窟很可能是北周造像，盡管我們現在還不知它的確切位置，但給我們提供了線索。就是說川北很可能有北朝造像，解放後的兩次調查都沒有注意北周造像，以後應注意這個問題。在夾江千佛崖，他們發現除這一處外其余造像基本屬唐代造像。他們還在綿陽漢闕——

平陽關上發現後代補刻的南朝梁普通三年（公元五二二年）的佛像。這是當時見到的有明確紀年的最早四川造像。

考察了上述的佛教遺迹，他們提出了佛教傳入四川的路綫問題。他們認為四川佛教是從西安↓漢中↓廣元↓保寧↓綿陽↓成都，即由『金牛道』傳入。另外，他們發現梁代造像，提出了由水路傳入四川的可能性能。從南朝的建康出發，由水路進入四川，這還有待考古發掘證實。現在看來，建康↓四川↓青海↓吐谷渾這條通道是聯係北方的柔然、高昌和南朝的水路通道，其中含一部分陸路。由這條通道傳入四川，也是可能的。

日本人對四川也進行了調查，但工作做得不細，沒有超過上述成果。上述成果可參看馮承鈞翻譯的《中國西部考古記》，一九五五年商務印書館重印。

解放後，我們對四川石窟進行了調查，但不普遍，主要是對大足石窟進行調查研究，出了些報告、圖錄。近年的文物普查工作中，有許多重要發現，所以四川石窟是尚待開發的石窟藝術寶庫。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皆為全國之冠。據四川同志調查，在四川省有近五十個縣、市有較集中的石窟群，窟龕在十個以上的就有一百二十個以上。就時代來說，盛唐以後（開元、天寶以後），尤其是會昌滅佛後，中原北方石窟，除莫高窟有西夏、元代洞窟，延安地區有宋金石窟以外，其余大部分衰落。就石窟主體來說，四川石窟在此之後，是異軍突起，四川各地均有造像。我們知道，四川早期造像不多，大部分鑿於盛唐以後，近四百年長盛不衰。

四川各地石窟各具特色，形成特點鮮明的四川石窟藝術體係。除規模外，就題材來說，不僅有非常寶貴的各種密宗造像題材，而且有隋唐時代佛道并行的造像題材，兩宋時期的三教合一造像題材，規模大、區域文。還有宋代刻經、造大像。

第二節 四川石窟的開鑿年代

四川造像歷史非常悠久，我們現在知道國內最早的佛教、道教與四川有關，特別是佛教造像。樂山麻浩、沛子灣崖墓、彭山崖墓所出明器中皆有佛像，是現知國內東漢佛教造像遺迹中可以肯定的少數幾件作品。崖墓這種四川特有的形式，可能對四川後來摩崖造像有一定的影響。

四川茂縣南齊永明元年造像，是現知有明確南朝紀年的最早的褒衣博帶式造像，題材就是「無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尊像」。這是南朝最早有關淨土思想的造像之一，這兩尊像雕刻較淺，立體感不十分強，突出表現衣紋，是南朝新型佛像的早期代表。此像已不存國內，有關資料保留在《石交錄》卷二中。造像主是「西涼曹比丘釋玄嵩」，這裏的西涼是地名，指西涼府、西涼州，不是國名。

一九八四年成都西南蒲江縣龍拖灣北朝摩崖造像群中發現一處西涼題記，為「嘉興元年（公元四一七年）張仁忠、許士忠」，嘉興是西涼王李歆的年號，相當於十六國後期。這個遺迹值得注意，有待今後進一步考察。

四川早期的北朝造像較少，但也有重要集中的發現，其中重要代表就是成都萬佛寺。解放前後出土的造像，見《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劉廷璧著。這批造像是清光緒十八年到解放前後先後分幾批陸續出土的。其中年代有劉宋、蕭梁和北周、隋、唐各朝，總數有二百多尊。其中有一尊宋元嘉二年（公元四二五年）淨土變雕刻，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有南朝紀年的一尊像。成都一帶也有五世紀末的造像，南朝風格更為濃厚、莊重、端雅。這批造像里，規格較高的一尊像是梁武帝的孫子——益州刺咧蕭庖在大通元年（公元五二九年）造的釋迦立像，披通肩大衣，螺髻。這個像一般作為南朝後期造像的典型代表。

現在，國內外學者在研究比較北朝的南朝造像時，經常引用成都萬佛寺的造像，這說明萬佛寺造像反映出南朝造像對北朝造像的影響，這一點值得注意。

另外，就造像題材來說，萬佛寺造像內容主要是祈求往生西方淨土，它的主像主要是無量壽佛和彌勒佛。反映了淨土思想是當時南朝佛教的主導信仰。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北周以後的造像開始變化，北方渾厚樸實作用和南朝優雅作風結合起來，但更接近於北方風格。

萬佛寺的這批造像還表明，四川早期的地面建築、寺院要盛於石窟開鑿。四川早期石窟遺存較少，主要代表就是廣元千佛崖和皇澤寺。這兩處石窟的早期洞窟和中原的北魏晚期洞窟接近（圖一）。近年發現北魏延昌三年（公元五一四年）造像碑，千佛崖、皇澤寺也大致可分出西魏北周時期的一批窟龕。這說明六世紀中葉以後，中原西部的石窟龕像已經影響到四川北部石窟。這兩處石窟的形制以佛殿窟為主，塔廟窟不多，整個四川石窟也是這樣。佛殿窟中的主要造像題材除釋迦外，是無量壽、彌勒和密宗題材等。

皇澤寺以中心柱窟為代表，中心柱窟窟形和造像題材與鞏縣石、須彌山石窟的塔廟窟類似。千佛崖三聖堂是方形平頂的小窟，三壁各開一圓拱龕。沿襲雲岡以來的三壁三龕式。這種龕形四川不多。每龕是一佛二弟子三尊像，主佛着通肩衣，手為禪定印，座為低方座，舟形背上雕刻出過運河七佛和飛天。旁雕二立菩薩，雙手在腹前交叉。這種窟形、題材樣式似為西魏、北周樣式，很可能就是廣元較早的洞窟代表。

廣元六世紀的窟龕造像大體上應屬於中原北方係統，這種造像與浙江一帶窟龕前建木構建築的南方窟龕體係不同，因而七八世紀中原典型窟龕中的各種淨土和密教形象也就開始流行於四川地區。八世紀後，岷江和嘉陵江流域盛行倚坐的彌勒佛、淨土變和觀世音造像。



圖一 廣元千佛崖大佛窟南壁脅侍菩薩



圖二 飛天（巴中南龕第七十八號）

廣元千佛崖、皇澤寺初唐以後出現了少量密宗題材。如四臂觀音和毗盧遮那佛（大日如來）。千佛崖蓮花洞右壁龕像，螺髻上嵌玉璧，頸部戴七垂珠瓔珞，右腕戴鐲，手施降魔印，應為毗盧遮那佛。窟中有武周萬歲通天時補鑿的小龕。千佛崖菩提瑞像窟，窟中設壇，主尊身著袒右袈裟，頭戴高寶冠，頸飾七瓔珞垂珠，右臂戴花形釧，腕佩手鐲，身後雕鏤空背屏。窟始鑿於唐玄宗以前，有《菩提瑞像頌》碑及五代前蜀乾德六年（公元九二四年）越國夫人重妝毗盧遮那佛記。巴中石窟位於交通古道米倉道上。其洞窟類型和造像風格接近廣元石窟，但時代稍晚。巴中南龕一百零一窟有一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尚書右丞張禕『追扈大駕』入蜀，後於此地『修釋迦像』的重要題記。四川石窟繁盛原因之一，是安史之亂後，唐兩代皇帝（玄宗、僖宗）到四川避難，帶了許多工匠和畫師，把中原文化藝術、佛教藝術帶到四川。說明巴中石窟與中原地區有很

多聯係。巴中石窟主要以南龕、西龕、北龕和水寧寺這四處較重要。巴中南龕造像較早的題記主要與當時的巴州刺史嚴武有關，嚴武於乾元二、三年（公元七五九至七六〇年）上書，要求重建寺院，命名為光福寺。救苦觀世音像銘里談到這個像『乃烈考中書郎遠日之所鑿』。南龕現存的造像題記，主要是開元以後，『如開元二十八年造釋迦佛……』，南龕有開元二十八年所鑿一軀釋迦雙頭瑞像，是敦煌以外石窟所見的雙頭瑞像題材。南龕的龕形整體造型較特殊，叫重龕或套龕，即敞口平頂，方形龕中又開一圓形龕或屋形龕。龕左右有華麗的裝飾，龕平面上鑿壇設像。造像形體豐腴，婀娜（圖二），主佛的佛座鑿出大背屏或靠背椅。背光和裝飾是廣元巴中一帶流行的特有技法——鏤空透雕花紋和飛天裝飾高浮雕。這些都是盛唐的特點。說明南龕是以盛唐作品為主體的造像群。但不排除個別造像早於盛唐。

西龕與龕大體相同。西龕第十窟就是雙室疊龕，主佛是倚坐勒佛，一鋪七尊像。西龕中有開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造像題記。值得注意的是十六窟，也是雙室疊龕，但龕面是屋形龕，龕柱雕禪僧柱，窟內鑿出一鋪九尊像和天龍八部法護像。廣元和巴中的天龍八部出現了人形化，這是唐代後期佛教密宗化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力士像旁有一題記『檢得大隋大業五年（公元六〇九年）造像件古像，永平三年（公元九一三年）院主僧傳芝記』。窟內還有唐代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游人題記。五代的僧人知道有一件隋代的古像，這裡問題是，前件古像是否存在？是指那一尊像？從十六窟中的後人題記、窟形、佈局、風格來看，應屬唐代。第十九、二十窟為一組雙窟，形制基本相同，主像是釋迦牟尼和彌勒。

二十一窟主像是毗盧遮那佛，戴冠，坐龍頭靠背椅，龍門石窟盛唐造像中亦見。三十五窟造像破壞較嚴重，殘存的左右兩壁立雕大型仿木結構的亭臺樓閣，非常逼真，表現西方淨土，從仿木結構形制和風格來看仍為盛唐的建築特征。總括而論西龕應是盛唐產物，亦不排除個別像時間較早。

巴中水寧寺現存窟龕亦均盛唐作品。第一窟雕刻水平較高，是這組石窟中最精美的一窟，過去人們不太重視，窟中有『巴州始寧縣令』題記。第九窟有成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墨書題迹。

與巴中毗鄰的通江縣，也有幾處重要石窟。如千佛崖麟德二年（公元六六五年）西方淨土變，初唐地藏、十五像等，都是彌足珍貴的初唐遺物。魯班石石窟，則以開元、天寶年間雕琢精美的西方淨土變等窟爲著。

川中地區（大足、潼南、安岳、資中），川中石窟區窟龕密佈，時代延綿，自成一體，更富四川地方特色。因此可以認爲川中石窟是集中了四川石窟的精華所在，最具四川特色。也是四川石窟逐漸擺脫中原北方地區影響，更具有地方和時代特色的所在。四川石窟的許多傳統特點都體現在此。如多密宗造像，多大佛，多道教和三教合一造像，多五代造像、多宋代精品及多整體規劃的大石窟等等。

下面概括介紹一下各區情況。

大足石窟過去以北山石窟開鑿最早，具體年代是晚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八九二年）。由當地節度史韋君靖主持開鑿。延續至晚唐，五代和兩宋的造像。其中五代造像占全部造像的一半，在全部造像題材中密宗題材大體上占三分之二。近年在文物普查中，又發現唐高宗永徽、乾封年間造像，是爲以東南最早的紀年像，把大足石刻的上限年代提早了二百多年，至爲重要。

安岳石窟現存造像多數也是盛唐後的作品。其中千佛寨較早，道光《安岳縣志》載開鑿於隋開皇十三年（公元五九三年）。乾隆縣志載『唐開元僧玄應主持開鑿』。雖然前者記載，應有所據，但從現存遺迹看，千佛寨接近乾隆版的記載，即大部分造像是盛唐後作品。現存千佛寨造像紀年有幾處，如第五十六窟有開元十年（公元七三二年）『普州刺史韋忠』題記。普州，唐時安岳之稱，包括現在的大足一帶。三十八窟有『開元二十年前安岳縣錄高……黎令賓』造像記，四十窟的外壁有

『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年）』造像記。根據縣志和現存遺迹看，並綜合窟形和風格來分析，應是盛唐前後作品。

開鑿時間並不是研究的惟一目標，就四川石窟來說早期造像並不是優勢所在，優勢恰好是中原北方衰落以後的晚期造像。川中地區造像特點是國內其它地區所沒有的。

安岳卧佛院有卧佛和刻經，這是七十年代後四川石窟的一個重大發現，已列入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岳卧佛院有涅槃佛和刻經窟，現存紀年大部分是開元年間的，其中有開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開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開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開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當然也有晚期題記。從造像刻經題記及洞窟造像來看，大體開鑿於開元年間。安岳另一處重要石窟遺迹是玄妙觀，有一方規制宏大的唐碑。根據唐碑記載，玄妙觀石窟開鑿於開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到天寶七載（公元七四八年）。最晚的題記是晚唐大中十四年（公元八六〇年）。這也是開鑿於盛唐時期的大型佛道并存石窟。另一處較重要的石窟是圓覺洞。有黎令賓造像題記，說明該處石窟中也有盛唐造像。這處石窟分前山和後山兩部分。前山有一尊五代廣政四年（公元九四一年）的供養像，『使持節普州諸軍事』聶公像，前山是五代造像的集中區，五代時稱山前寺院為靈居寺。後山又稱真相寺，造像主要是宋代的。

安岳還有二處石窟，淨慧岩和庵堂寺。根據碑記，淨慧岩石窟創建於唐乾元初（公元七五九）年左右），南宋時倚岩居士趙慶升重修。所以淨慧岩石窟是盛唐後期之作，南宋進行了重修，現有的造像還可看到盛唐遺迹。庵堂寺是安岳縣五代密宗造像集中的地區，有多處五代紀年題記和密宗題材。有天復、天漢、咸康、天成等紀年題記。

還有另外三處：茗山寺、華嚴洞、毗盧洞，據題記大部分是兩宋時的造像。
潼南地區，主要造像有三處，第一是大佛寺的大佛，鑿於晚唐咸通——廣明年間，北宋末年重

修。第二處，潼南大佛寺崖壁上的幾個小龕，根據題記和造像風格看是隋開皇、大業年間的道教天尊像，這是四川時間較早的道教像。第三處千佛岩，根據題記是晚唐大中年間的造像，其中有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十年（公元八五六年）、十一年（公元八五七年）造像題記，題材是佛、道像。

資中地區，資中石窟據文獻記載是最早造像是天寶十載（公元七五一年）。現有造像記年最早的是唐貞元四年（公元七八八年）。多數造像是晚唐和五代開鑿的，也有宋代作品。它也是由分佈各處的石窟組成的群落。其中最有名的是北岩，《重修北岩院記》記載的開鑿時間是唐建中（公元七八〇年至七八三年）年間。北岩現存造像題記大多是晚唐大中、咸通、乾符等。山上的像基本是五代的作品。西岩造像以五代為主，也有部分晚唐、北宋作品。東岩，以北宋一尊大佛為中心開鑿。南岩，有貞元、咸通題記，鑿於晚唐。此外還有兩處：月仙洞、垮石岩。月仙洞大佛時代是晚唐，垮石岩也是一尊唐代大佛，時代是唐武宗「會昌五年九月」開鑿，根據現存狀況看，會昌毀佛時，它受到了局部損壞，後代進行了補修。

下面簡述從川北、川東北至川中地區石窟的開鑿情況。

從上述情況看，可清楚地見到：廣元和巴中石窟曾受到中原造像較多的影響。它的形制和造像格局基本上仍屬中原北方係統。而深入到四川腹地的川中地區，時代和地方特色就愈加鮮明。在四川石窟群中，除廣元石窟開鑿於北朝以外，巴中和川中四縣石窟遺迹，大多是盛唐以後的產物。晚唐、五代、兩宋是川中石窟發展的盛期。這一時期恰好是中原北方石窟趨於衰竭之時，而川中石窟却以更為成熟的形式、更為鮮明的世俗特點、更為濃鬱的地方特色、更為豐富多變的題材內容獨樹一幟。因此四川石窟的興起，標志着中國石窟造像中心南移之新時期的到來。

四川石窟的崛起原因，除中原北方地區迭遭劫難（如安史之亂，會昌毀佛和五代戰亂），蜀中地

區政治、經濟、社會相對安定、繁榮，安史之亂時兩個皇帝相繼避難入蜀，隨之避難入蜀而來的大批文人、學士、畫工、技巧百匠等文化精華，為四川石窟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此外，從佛教方面來考察，密宗的傳入和滲透應該說是四川石窟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盛唐以後，蜀中特定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及密宗的傳入給四川石窟帶來新的生機和活力。

關於密宗的起源，當由印度談起。印度佛教發展到後期即公元七世紀以後，在印度興起了印度密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文化傳統相結合而產生的佛教宗派密宗，正式形成在開元時（公元八世紀初）。在此以前，許多印度密教的經典已陸續傳入中國。早期傳入的密教典籍、佛經，大多數是雜密經咒。印度密教分二大派：一為雜密；另一派是正純密教。開元以後是正純密教的傳入，而雜密從東晉就開始傳入。開元以前，隋、初唐時一些中國的譯經師，如玄奘、義淨等譯了不少雜密的經典經咒，其中玄奘譯十部。如《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等，這些譯經師譯的經盡管多雜咒，但對密宗在中國正式傳播有直接推動作用。國內現存初唐密宗造像很可能與這些譯經有關。國內現存開元以前密宗造像代表是龍門劉天洞和廣元千佛崖蓮花洞的毗盧佛，敦煌莫高窟三百二十一和三百三十四窟初唐的十一面觀世音壁畫。密宗正式傳入中國并形成宗派，主要是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弟子們所創立。密宗和禪宗一樣成為唐後期重要的佛教宗派。密宗形成宗派有很多發展傳播渠道。主要分兩大部：胎藏界——以善無畏、一行為首，奉《大日經》為主要經典；金剛界——以金剛智、不空為首，主要經典是《經剛頂經》。在中國流行較盛行的是金剛界。三大士中貢獻大且對後代影響大的是不空。他的傳承不僅受金剛界的密法，而且也自一行接受胎藏界的傳承。他還譯出了《金剛頂經》，他的傳法弟子較多，最著名者人稱「六賢哲」。開元三大士開始活動主要在長安，基本道場就是大興善寺。不空弟子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與四川石窟有直接關係的是惠果。惠果時主要道場是長安的青龍寺。當時稱他為「密宗大師」。不空

曾受河西節度使邀請，到河西傳授佛法，所以敦煌莫高窟一帶密宗的流傳與不空有很大關係。

惠果在中外密宗史上都是一個關鍵人物，他門下弟子衆多，遍佈海內外。其中，外國弟子中有名的有新羅（南朝鮮）和訶陵（爪哇島），還有日本的空海，被稱爲弘法大師或阿黎（密宗大師之稱）。空海從中國學到密法後創造了日本密宗，又稱真言宗。日本學者來中國學習密法的有兩派，一派是以空海爲代表，稱爲東密。另一派由日本僧人圓仁、圓珍所創，叫臺密。

國內傳播的另一係統，是內地與尼泊爾的密宗在八世紀時同時傳入西藏吐番王朝，并與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相結合，形成藏傳佛教。按密宗說法西藏的這種密宗叫藏密。

晚唐以後，密宗的發展情況材料較缺乏，佛教史或思想史在這一時期形成間斷，實際是沒有注意到四川與敦煌的密宗材料。晚唐後，敦煌和四川的關係非常密切，就密宗造像題材來說，存在着互相影響，互相學習，基本一致的情況。如果站在四川角度來說，敦煌造像中的密宗經典很多是由四川傳入，當然敦煌也影響到四川。宋代以後兩地關係也很密切，就是說密宗在晚唐後似乎失傳，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最近，法門寺地宮里出土的佛教材料，其中有許多密宗的內容，是研究晚唐密宗情況的極重要材料。四川石窟興起之後，正是北方石窟轉衰，且北方密宗幾乎失傳，這裡就提出一個問題，密宗怎樣傳到四川？通過什麼綫索或途徑傳入？目前還待探討。

關於密宗傳入四川的時間問題，由於材料有限，不可能多談，但還可以談一些情況。

日本密宗創始人空海得到惠果的真傳，空海在惠果死後親自寫了《大唐神都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灌頂阿闍黎惠果和尚之碑》，以示紀念。此碑與中國人撰寫《惠果行記》都指出惠果的著名弟子中，有「劍南惟上」或「成都惟尚」。劍南即劍南道，中心在成都一帶。可見當時成都地區已有密宗流傳，而且直接與長安掛鉤。從現存實物看，晚唐的成都和長安地區有許多遺迹。例如，成都唐墓出土「卞冢造陀羅尼經」，時代是晚唐，印經地點就是在成都府。這是密宗廣泛流傳的證據之一。晚唐